

# 近40年来二程思想研究综述

敦 鹏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二程思想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宽广的研究态势。学界就二程的天理论、心性论、伦理观、二程思想异同、政治哲学以及与佛道之间的关系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挖掘与考察,成果丰硕,成就卓越。总结40年来的二程思想研究,不仅有助于展示二程思想所蕴含的丰富文化资源,而且也引发我们未来就如何提升二程研究作出新的思考。

**关键词:** 二程;理学;天理论;心性论;伦理观;佛道论

**中图分类号:** B24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5)04-0045-08

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是北宋理学的奠基人和洛学的开启者,在“北宋五子”中,二程兄弟所创立的“洛学”历来被认为是著述最多、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派。作为传统理学的代表性人物,二程自信地认为他们的学说把孟子以后中断了1400年之久的儒家道统真正承接了下来。不仅如此,从宋明理学体系的发展轨迹来看,二程思想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学术界不可忽视的一个研究重镇。

## 一、研究概况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视角、价值定位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二程研究在大陆学术界遭到极大的冷落。尤其到“文革”结束的这一时期,人们基于政治立场的划分,对二程以“地主阶级思想家”而简单否定,认为二程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sup>[1]584</sup>。“文革”时期更加剧了这种不正常的学术现象,对二程的思想研究被捆绑在“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战车上,二程作为“法家”思想代表人物王安石的对面被加以批判,得出所谓“反动儒家”的错误结论。这期间出版的两本论文集《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程颢程颐言论思想选批》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状况<sup>[2]</sup>。

“文革”结束后,人们首先对“文革”期间关于二程思想的歪曲和片面理解进行了拨乱反正。随着新时期学术事业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二程思想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宽广的研究路向。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里出版发表的有关二程研究论著看,研究内容涉及二程思想的各个方面,

**收稿日期:** 2015-04-13

**基金项目:** 河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北宋二程政治改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SD1511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敦 鹏(1983-),男,河北石家庄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其中包括生平、著作、影响、地位等,对二程的理学、经学、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思想也都有所关注。老一辈学者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刘象彬的《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1987)、徐远和的《洛学源流》(1987)、卢连章的《二程学谱》(1988)和《程颢程颐评传》(2001),这些论著为新时期的二程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些中青年学者异军突起,发表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如潘富恩、徐余庆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1988)、庞万里的《二程哲学体系》(1992)、蔡方鹿的《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1996)、徐洪兴的《旷世大儒——二程》(2000)等等,这些学术成果都进一步深化了对二程思想的研究。除专门涉及二程的论著之外,众多的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史以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等专门史都对二程有所涉猎,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99),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982),郭齐勇、冯达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4),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1984),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1985),陈来的《宋明理学》(1991),蒙培元的《理学范畴系统》(1989),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1996);港台地区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1980),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2003),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2005)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国公开刊物发表关于二程的学术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超过 300 篇,尽管部分文章的质量良莠不齐,但至少说明对二程思想的关注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的沉寂局面,与“文革”及前“文革”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硕士、博士以二程为选题对象,从伦理、美学、易学、诗文、语法等角度对二程思想展开了分类考察。

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对二程思想的研究从未间断。台湾地区这一时期共出版二程研究专著 3 本;另外,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1984)、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2004)与《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2008)都对二程的哲学、政治思想有所论述。

海外出版的二程研究著作首推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A. C. Graham)的《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1999)一书,该书是在作者 1953 年完成二程研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特别指出,葛氏的二程研究成果在西方广为传播,公认这部书对那些试图弄懂中国思想后期发展的学者(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来说,都是必读的文献。该书中译本一经出版(程德祥译,大象出版社,1999 年)就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张岱年、任继愈等先生为该书作序,充分肯定了它的学术价值和研究贡献。

通过考察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二程思想研究在内容和选题上得到了拓展,研究水平得到了提升,甚至不乏深刻独到的见解。

## 二、观点述要

### 1. 二程的天理论

学术界对二程的天理论高度重视,认为二程以“理”为最高原则构建其哲学大厦,这种理论已经成为哲学史界的一贯看法。针对程颐说的“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冯友兰认为“所谓理是事物之所以然,也是事物的准则。按照这种说法,理是永久为有,不增不减。人知之与不知之,与其为有无关”<sup>[3]115</sup>。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程颢、程颐的哲学最高范畴是“理”或“天理”,是二程用来说明世界的立足点、出发点,是世界万物的本体。

将“理”作为二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范畴,对此学者们没有异议,但对“理”或“天理”作为宇宙的本体的性质和作用却有不同的看法。冯友兰认为,程颢所言之“理”是事物的自然性而非规定性,程颐之“理”有更多的“应然性”,是事物的“所以然”<sup>[3]118</sup>。也有人认为,程颐讲“天理”,更偏重于准则、规律之义,一物之理是一物之准则,万物之理即万物之所应该。相比之下,程颢的“天理”更多地着眼于万物的自然状态,这既不是上帝的目的性行为,也不是人为的刻意安排,而是自然趋势,自然自得<sup>[4]</sup>。还有一

种观点认为,二程虽然在“理”的应然与自然之间存在差别,但二者都将“理”作为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内在依据,同是为了说明遵循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当然之则”,二人的现实目的是一致的<sup>[5]99</sup>。

对于“理”的讨论,还涉及到“理”能否派生万物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理”作为本体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始基”,作为最高的、唯一的本体,并不能派生万物;另一种观点认为,“理”蕴含着运动变化的潜在动力,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和根据。还有学者关注“理”作为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的属性问题,分为:其一,“理”作为物质世界的本原;其二,理是精神世界的本原;其三,“理”是客观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不难看出,学者们对“理”的内涵分析一方面受到了西方哲学划分精神与物质的主客二分思想方式限制,另一方面诠释与透解的视角单一平面,“理”的深层思想意蕴还远没有挖掘出来。

## 2. 二程的心性论

心性论在二程的哲学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只论天理而不及心性,还不足以把握二程哲学的全貌。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对二程的心性问题有详细论述,他认为,二程的心性论承接孟子“尽心知性知天”这一纵观系统,心与性在先验逻辑上包涵了天德,从尽心、知性以参与天地万物之化育这是二程心性论的特点。根据二程提出“性即理”,牟宗三认为,万物皆有生生不息的天道,天道即天理,生之谓性又是“天命之谓性”在人和物上各自不同的表现,性即理表现为原本的清明与充足,“恶”不是来自“理”而是气稟的过和不及<sup>[6]160</sup>。

劳思光认为,二程所论之“性”有形上之意,若能保持“性”之本来方向,则是“善”;若失去其本来方向,即是“恶”<sup>[7]152</sup>。在劳思光看来,二程谈的“性”并非个别事物或对象,也不在时空当中,只能视为形上意义之存有,如此一来,性与理便是合一的。葛瑞汉认为,新儒学的总趋势是把“性”认作一种“体”,它与生俱来,存在于人身上,所有那些不能归于外界影响的一切都属于“性”。而“心”并非单指人的肉体器官,而是对“理”的洞察和发动之处,这就使得“心”与“理”在圣人那里达成合一,而一般人只能通过循序渐进来通达“理”<sup>[8]99</sup>。蔡方鹿也认为,二程之所以对善恶问题有不同理解,这与他们对“性”的理解及对心、气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程颢将“性无内外”、“心无内外”作为其理论特质,认为大程承认心、气的欠缺所产生的“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程颐则强调心、气之分,性为本,心、气为稟,性为本则无不善,心、气则有善有恶<sup>[9]96</sup>。王育济认为,二程的天理与心性在哲学上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关系,导致后来的“天理”、“人欲”之争,这种纷争造成二者形同水火的对立关系,他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已经不止是对人的感性自然欲求的窒息了,而是连人的生活、活命的权力也被完全剥夺和扼杀了,最后变成了极端道德主义的说教。”<sup>[10]88</sup>

比较而言,学者们对二程心性论在阐述的倾向性上有所不同,但在性、心关系上大多承认“性”表现为先验和一般的特征,“心”更受经验和后天的影响。但正是二程这种开创性的命题和观点,引起了后来理学家的广泛兴趣,形成了对心性问题的不同认知取向。

## 3. 二程的伦理观

二程的伦理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中国伦理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影响深远,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卢连章在《程颢·程颐评传》中把二程的伦理思想划分为“三纲至上的人伦观”、“以义致利的义利观”、“以公克私的公私观”、“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敬诚为本的修养观”等内容。蔡方鹿将二程伦理思想集中阐发为“义利”、“公私”、“理欲”等关系,由此也可以看出二程伦理观的主要内容。

学术界普遍认为,一方面二程以“天理”为宇宙本体,论证了儒家伦理的合理性,同时在“天理论”的前提下,二程对现实人间秩序的伦理探索才是他们思想的重心所在。李泽厚曾认为宋明理学的特征是将伦理提高到本体地位,以重建人的哲学。“伦理”能否作为本体姑且不论,但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确实将伦理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章启辉认为,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哲学从来不具有独立发展的意义,都只是儒家伦理的论证工具。二程建构的宇宙本体,更重要的目的在

于赋予“天理”以宇宙本体和道德本体的双重含义<sup>[11]33</sup>。有研究者认为,二程的理学伦理观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抹杀人的感性欲求,带有宗教禁欲主义倾向。反对者认为,二程的伦理观承认饮食男女的基本需要,在立场上是反对佛教禁欲主义的。崔大华对此进行了较为中肯的分析:二程兄弟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同时期的经院哲学相比,更具有理性色彩。只不过,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之所以衰落在于否定了人性中的积极(人欲)一面,同时忽视了道德进步中的知识因素,终究导致了理学八百年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之树结下了一个“以理杀人”的苦果,在实证科学领域越发显得孱弱和落后<sup>[12]43-44</sup>。

#### 4. 二程思想的异同

二程兄弟思想的关系及其异同历来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随着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放大对立,学界开始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研究二程,对于二程思想的异同在当代学术界有代表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种观点认为,二程思想基本一致,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侯外庐在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明确反对将二程之间划分成开启两个学派的观点,他说:“二程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思想相似,大体是一致的。当时他们的弟子每每记录是说时也并不加以分别,虽有人提到二程的性情、‘气象’有所不同,如程颢和易、程颐严重,但对于他们的学术当时从无人指出有什么分歧。近人或说程颢开启陆王一派的渊源,程颐则开启朱熹一派的渊源,这种论断并不合于史实。”<sup>[13]572</sup>在他看来,二程思想的一致性主要来自二程,尤其是小程在谈及自己与兄长思想的关系时说“盖与明道同”,二程弟子在整理其师思想资料《二程遗书》并没有将二人加以区分,多数都以“二先生语”并称。张立文在《宋明理学研究》一书中也认为,二程思想为一个整体,“近人有以程颢程颐分别开启理学中的陆王、程朱两大学派,此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从根本上说,二程思想基本相同,故本书二程合论”<sup>[14]261</sup>。徐远和在《洛学源流》中直接以“二程”合一来论述“天理论”、“泛神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理欲观”、“圣人观”等思想,在他看来,二程在以上方面“大体是一致的”,但他们在共同的理学唯心主义前提下,表现了不同的哲学倾向<sup>[15]83</sup>。潘恩富、徐余庆在《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中同样认为:“二程兄弟在许多哲学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sup>[16]207</sup>另外,蔡方鹿等学者认为,在二程思想的同异变化上,其哲学的相同方面是主要和基本的,因此,在对二程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以“二程”并称,也体现了这一态度<sup>[17]25</sup>。

与此相反的另一观点认为,二程哲学思想存在根本不同,并且二人分属两个思想系统。持这一观点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为冯友兰和牟宗三。冯友兰先生在其早年《中国哲学史》中就曾将明道与伊川分属不同的思想范畴去陈述,指出二人不仅不能随便视为一家之言,而且得出:“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所谓程朱陆王之两派,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之两派。程伊川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为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sup>[18]238</sup>换言之,冯友兰先生认为二程思想开启两个不同学派就潜涵着二人之间的不同立场或分属两个不同思想系统。虽然冯先生也说二程之学是“大同小异”,但直到晚年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仍然认为“二程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这一结论。

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在《心体与性体》中将宋明理学划分为三系,其中程颢、胡宏、刘宗周代表《中庸》以来的纵观系统,程颐、朱熹代表《大学》以来的横贯系统,陆九渊、王阳明代表了孟子以来的自律系统。牟宗三认为,明道和象山从总体而言都属于“纵观系统”,“纵观系统”为儒家正统,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只是“别子为宗”,就此言之,二程之间当然有根本性的差别。特别指出,牟氏对大程的抬高和对小程的贬低可以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同时这也影响了其弟子(如蔡仁厚等)对二程思想差别的评价。

另外,庞万里在《二程哲学体系》中也对此有所论述,认为二程“在理论上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复杂情况,不可能简单地对两人思想做绝对的、确定的、划一的划分”<sup>[19]85</sup>。在他看来,二程哲学存在着一

元论与二元论、道器为一与道器为二、内外一体与内外有别等差异,这实际上已经将二程思想作了不同系统的划分。

与以上两种观点所表现的鲜明性不同,很多学者更加持二程思想间存在着诸多共性,但又各有倾向的中间立场。葛瑞汉认为,二程兄弟的差异是有的,这导致了二程后学之间的尖锐对立,“但这些差异只不过是强调的侧重有所不同而已”<sup>[8]11</sup>。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将差异表述为“明道的思想给人一种显明的玄学特质,伊川则比较落实”<sup>[20]1119</sup>。韦氏认为,小程更加重经验知识,而大程有道德精神的超越化,“在道德意识的融通中,不但人事与天理合而为一,道与器,神与器,也无二别”<sup>[20]1123</sup>。陈来也认为,二程在本体论上不存在根本区别,区别在于境界取向不同,“程颢比起其弟程颐来,更注重内向的体验,而轻视外在的知识。但程颢并不像后来南宋心学的代表陆九渊那样强调心即是理,更不像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理,他对内向体验的强调主要是基于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不同,而这种境界的不同,并不是南宋‘心学’与‘理学’的根本分歧”<sup>[21]90</sup>。徐洪兴在《论二程思想之异同》一文中详细考察了二程兄弟在气象上的差异及对二程思想异同认识的历史演变,提出二程思想“大同小异”的观点,“大同”即他们共同致力于建构“理”本体论这个关节点上,“小异”主要异在工夫论上<sup>[22]64</sup>。

从以上关于二程思想异同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二程哲学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得出同一或对立的结论,因为这背后涉及的不只是文本的研读和判别,更重要的是二程思想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思路流派,不同的立场得出的诠释结果都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影响客观公允的理性分析。只有在对基本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逐级分层对存在的差别深入对话,才有可能厘清二程之间哪些是同、哪些是异的复杂关系。

### 5. 二程的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是近年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政治哲学是把握政治世界最深层本质和普遍性的学问。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儒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自然有其自身的政治哲学。二程政治哲学作为儒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同样给予了关注,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第一,从政治哲学与宋代理学的关系进行了阐发。早在20世纪40年代,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就谈到,理学与功利思想为宋代政论之两大主流。理学一切以心性仁义论政,虽自命继先圣之绝学,实阴取“二氏”之异端以立门户,而对政治思想之贡献则极细微。其政论大旨不外搬演《大学》、《中庸》之正心诚意,《孟子》之尊王黜霸与乎一治一乱诸陈说而已。他认为,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抗之功利思想。此派特点在斥心性之空谈,究富强之实务。刘泽华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大视野考察了宋代理学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他认为,从先秦以来的政治思想史看,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治思想蕴含着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政治思想的形上发展。在谈到二程等理学家的政治哲学时,他认为,理学诸子把传统辩证思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表现在政治思维上是各种调节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哲理化,较为妥帖地回答了政治运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但是,这种哲学又保持着传统儒学的本色和主旨,即崇礼、贵仁、尚中、求和等基本特征。

第二,对二程政治思想和王安石熙宁新政的关系作了探讨。有论者认为,二程作为保守派和顽固派,采取对王安石变法不合作的态度,暴露了其唯心主义的阶级实质。反对者认为,不应把二程的政治思想简单地等同于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他们的学说包含着反对君主独裁的一面。第三种论点持辩证立场,如潘富恩、徐余庆认为,二程的变革理论有其积极主动的一面,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手段,二程和王安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李存山认为,二程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最根本的原因已非政见不同或朋党敌对关系,而是“道不同”。这在具体的措施上,表现为对王安石倡导“兴利”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的不满。二程更强调“正君心”是“施仁政”的基础和保证,设想政治统治者以内圣的建立才是

开出外王的前提,因此二程的政治哲学更加强调伦理道德对政治的限制和引导<sup>[23]122</sup>。

第三,对二程政治学说的具体方面进行了分析。余英时在《程氏〈易传〉的政治思想》一文中对程颐《易传》中的君臣性质、臣民关系及政治文化秩序作了解读。他认为,北宋以来的“士”阶层以政治主体自居,提出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要求,程颐《易传》是其发挥传统儒家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另外,潘恩富、徐余庆基于二程的政治学说,对其人才观、刑治与教化思想作了具体阐释;蔡方鹿、卢连章对二程的政治思想作了专门分类说明,在此不再一一论述。

通过学界对二程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的考察,我们发现,学者们对二程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开始有所关注和重视,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二程的政治学说的阐发较为空泛,研究者多对二程本体、心性等问题作详细论证,对其政治思想部分往往一笔带过,或论述略显重复,没有作专门的深入分析。再有,如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有些已经过时,没有与当前政治哲学的前沿问题进行对比,得出的结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气息。另外,研究的目的和对象不够明确,这体现在对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定位较为模糊,虽然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往往掺杂难分,但我们有必要将二者的概念界定清晰。

## 6. 二程的佛道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者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宋代之后,儒家学者充分利用释、道两家的思想资源,实现综合创新,创立了儒学的新形态——宋明理学。关于二程与佛、道关系的渊源,学术界有这样几种看法:

(1)二程理学与佛学思想。章启辉认为,二程之学与周敦颐存在学术师承关系,周子的佛学思想对二程很有影响。应当说,二程从周子处学得援佛会儒,悟得佛学,从而造出新儒学即理学。然而,二程援佛似乎更多的是辟佛,二程从对佛学的攻辟中创造和阐发了自己的理学思想<sup>[24]87</sup>。

卢连章认为,程颢、程颐在建立理学体系时,对佛教的出世主义、轮回报应等思想持批判态度,对禅宗、华严宗的本体论、心性论持吸收融合态度。从二程兄弟哲学异同的角度看,程颢较多地吸收了禅宗的佛性、真如本心等本体论、心性论的形式,使他的思想具有心本论倾向。程颐较多地吸收了华严宗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等本体论、心性论的形式,从而形成了理事二分的理本论<sup>[25]152</sup>。

李承贵指出,二程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从儒家的立场看,有其合理性;从佛教的立场看,则表现为相当程度上的对佛教的误读。但二程对儒佛关系的讨论,在层次上开始了由表入里的转向,在程序和内容上也更加理性和丰富。他认为,二程对佛教的批评是一种基于道统意识支配下的自觉误读,是文化选择的必然态度,在此过程中,二程持偏执僵硬的道统立场执意判别儒佛之间的优劣,是不能原谅的文化保守态度。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宋代理学家对佛教的初步预制,以一种“儒体佛用”的模式加速了佛教走向式微的步伐,同时也推动了儒学复兴的进程<sup>[26]106</sup>。

(2)二程理学与道家思想。有学者认为,理学在建构过程中,对道家道教文化表现出了很大的认同,在孙以楷主编的《道家与中国哲学》(宋代卷)一书中,对二程思想与老庄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了专门梳理,该书从“天理”与“天道”、“定性”与“心斋”“坐忘”、“格物穷理”与“庖丁解牛”等方面将二程哲学在本体、心性和工夫论上依次作了对比,得出道家哲学与二程理学的深层次思想渊源。刘固盛认为,二程人性论中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理论建构,并非原始儒家的自然延伸,而是受到了当时道教学者陈景元、张伯端老学思想的影响,老子之学的精华二程理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sup>[27]55</sup>。杨翰卿认为,二程洛学之所以成为思辨化、哲理化的儒学新形态,与吸纳改造道家哲学密不可分,表现为:一是他们吸收改造了道家的道本论思想,“道”与“理”在哲学本体上并无二致;二是借鉴融摄道家的宇宙生成论思想,创立了“理”、“道”本然自然而显现外化为天地万物的宇宙生成气化说,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其儒学天理论的内容<sup>[28]148</sup>。

前面对二程研究发展的主要成果作了介绍,除了以上方面,近年学界对二程与其他学派的关系,二程的经学思想、教育思想、历史哲学、学术功绩和评价等内容一一作了分类和阐明,这些研究成果都大大拓宽了人们对二程思想的认识范围。本文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 三、结语

纵观40年来学术界对程颢、程颐思想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近40年的时间,二程思想研究逐步改变了过去单一、平面的讨论模式,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论调,研究视角和范式的转换也有了明显的突破,在学者们的研究中不再以意识形态权威预先设定二程思想的“反动本质”,而是当作古代先贤的智慧载体加以“同情的了解”。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末“诠释学”方法的引入,学界普遍认为二程文本中的丰富思想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大思想家的魅力在于他们的思想拥有无限的阐释空间。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相对于朱熹、王阳明等宋明理学家而言,对二程的研究还谈不上完备和充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探讨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逻辑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且受制于西方哲学式的理路归类,而对中国哲学家的思路体系缺乏本土的内在理解。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角度去解读二程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天人观、人性论等几个方面兜圈子,这实质上还是被捆绑在西方文化中心的学术马车上的表现。

总之,近40年来二程思想研究的总体面貌尽管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这些新成果不断涌现的背后是学者们艰苦卓绝的思想探索,也是中国文化复兴背景下的意识自觉。

### 参考文献:

- [1]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2]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75.
-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付长珍.程颐境界哲学的理性之维——兼论二程境界的不同取向[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6(5):63-69.
- [5]袁德金.试论程颢程颐理气说之异同[J].中州学刊,1984(1):68-73.
- [6]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第6卷)·心体与性体(二)[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
- [7]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3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8]葛瑞汉.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 [9]蔡方鹿.二程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 [10]王育济.论二程的“天理人欲之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86-94.
- [11]章启辉.二程天理论的伦理学特质[J].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1):32-43.
- [12]崔大华.理学衰落两个理论因素[J].哲学研究,1989(3):41-44.
- [13]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第4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4]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 [15]徐远和.洛学源流[M].济南:齐鲁书社,1987.
- [16]潘富恩,徐余庆.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 [17]蔡方鹿.二程哲学的异同变化及其对陆王心学的影响[J].河北学刊,1995(3):25-29.
- [1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19]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 [20]韦政通.中国思想史[M].台北:水牛出版社,1980.

- [21]陈 来.宋明理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 [22]徐洪兴.论二程思想之异同[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64-71.
- [23]李存山.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J].中州学刊,2004(1):117-124.
- [24]章启辉.程颢程颐与周敦颐的佛学思想[J].求索,2001(5):87-89.
- [25]卢连章.二程理学与佛学思想[J].中州学刊,2004(4):125-130.
- [26]李承贵.二程的佛教观及其思想史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3):106-113.
- [27]刘固盛.二程人性论的道家思想渊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3):51-55.
- [28]杨翰卿.论二程洛学继承创新的特征[J].中州学刊,2007(6):145-149.

## Research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 in Recent Forty Years

Dun Pe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re and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study Cheng Hao and Cheng Yi thoughts, showing a more diverse and broad research situation. Cheng Hao and Cheng Yi theory, such as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ethics,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etc were deeply excavated and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are fruitful, achievement is outstanding. Forty years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 thoughts research summary is beneficial not only to show that Cheng Hao and Cheng Yi thoughts contains rich resources, but also caused that we make in the future, how to improve Cheng Hao and Cheng Yi research to new thinking.

**Key words:** Cheng Hao and Cheng Yi; Neo confucianism; theory of mind and nature; ethics; Buddhism and Taoism theory

(责任编辑 张春生)

---

##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以及其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